

愛之夢

家，這是一個飽含著無限幽深詩情的字眼。它對每個人來說，也許有憂傷，有痛苦，有不幸，但也會有溫馨，有純真，有夢幻。它是人們降臨世上的第一驛站，是滋養生命成長的搖籃。它像一個幻影，將伴隨著你走向新的旅程。直到耄耋之年，它還會是人們憧憬、眷念的精神土壤。那芬芳的鄉土和被風雨剝蝕了的門樓照壁，都會引起你對人生的悵惘和感慨。因為你的生命之水，越過亂山碎石，激蕩匯聚而成的那股激流，在奔騰前行中，時時可以覺察到那源頭水質的積澱和品格。

在巴金漫長的人生旅程和文學創作的印跡中，都能尋找到他與這個“家”的扯不斷、理不清的千絲萬縷、血肉交融的關係。

家的存在和變遷，在人類歷史上，據說可以追溯到大約五十萬年甚至更早以前。不同的家就是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象徵。它作為社會的一個細胞存在時，本身往往就是一個社會。家庭是與婚姻、性愛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像是三位一體的產物。到了文明社會，由此派生出來的倫理、綱常、道德，就是用來維繫家庭關係，進而維持社會秩序的。家對於人生和社會的影響，成了一張無可逃脫的網。巴金在回顧以往的歲月時，總是對這個“家”的淵源細加考問和剖析，流露出交織著愛和恨的深情。

1. 官宦人家

1904年11月25日，當巴金來到人世，睜開眼睛看到的第一個形象就是他的母親的面顏：

一張溫和的圓圓臉，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頭髮，常常帶笑的嘴。淡青色湖綢滾寬邊的大袖短襖，沒有領子。

尤其使他不能忘記的是母親溫柔的聲音。是她，讓他在溫馨、和平的氣氛中度過了幼年時代。

巴金降生在一個世代做官、數世同堂的大家庭。在成都李公館裡，他“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他將在這個上百口人的小社會裡生存成長。

當時，李公館裡的最高家長李鏞，是巴金的祖父。他當過多年的縣官，是一位精明能幹的官吏，宦囊頗豐。所以卸任以後，他能夠廣置田產，在成都北門正通順街購置修建了一座五進三重的大宅院，收藏了許多古玩字畫。

李鏞的祖父李介庵原籍浙江嘉興，當年遠遷入川，進入仕途。李鏞的父親李璠當過多處縣官，添置了一些田產。然後，是李鏞使李家大大發達起來。

李公館在成都北門一帶是有名的殷富之家，正通順街也正是官宦人家聚居的住宅區。李鏞的大兒子李道河、三兒子李道洋都當過知縣，二兒子李道溥秀才出身，留洋日本，當過四品的“道台”，後來當過大律師。在李鏞父子的努力下，李家達到鼎盛時期。李鏞很自然要感激皇恩浩盪、祖宗蔭庇，不僅出於因襲的封建禮教觀念，也由於現實既得的利益，更加需



成都老家怡盧大門

要維護傳統的等級森嚴的制度，傳播傳統的思想文化道德觀念，來強化延續他們的家業。

李公館上下近百口人，就在這樣一個封閉的、既定的秩序中生活，像鐘擺一樣日復一日地原地運動。

2. 詩禮相傳

當時的成都地區，依賴於天府之國膏腴肥沃的土壤、溫和的氣候、富足的物產，聚居了大批官僚地主鄉紳家庭，過著衣租食稅、奢靡浮華的生活。

四川鄉紳極有勢力，地方公益、行政民風等都在他們的把持、影響之下。19世紀以來屢屢發生的教案，幾乎都是鄉紳們領頭鬧起來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其中之一無非是因為傳教活動侵犯了他們的利益，也因為新的思想文化輸入使他們有“禮崩樂壞”的危機感。辛亥革命前夕，各地發生的保路風潮也數四川最為激烈，因為四川集款最大，四川鄉紳們組織的“保路同志會”也極活躍。這些社會風波不知不覺地也在影響著李公館。

從李介庵開始，李家數代都還是書香人家。他們不僅通過仕途光耀門楣、發家致富，而且始終不忘儒家詩教，以為興、觀、群、怨的工具。李介庵雖出身儒生，但未見詩文流傳。李璠、李鏞則存有詩文集：李璠的集子叫《醉墨山房僅存稿》，李鏞的集子叫《秋棠山館詩鈔》。清代印刷業發達，許多官僚撰寫、刻印詩文集廣為贈送傳播，不只是為了附庸風雅，表示自己並非不學無術之輩，也是當時官場風氣，在作為交際之用的同時，反映了對傳統文化的重視。

李鏞前後娶過兩房夫人，都是知書識禮、能詩會文的大家閨秀，分別



巴金全家合影

著有詩詞集《晚香樓集》和《意眉閣集》。大媳婦陳淑芬，也就是巴金的母親，更是一個熟讀詩詞、頗有文化修養的女子。李鏞的幾個兒子多數有較高的文化素養。當時雖然海禁開放，但也只有思想不那麼保守的人，才有興趣到外面的世界去學習。特別是在 1904 年之後，四川留日學生突然大增，最多的時候達到兩三千人。李鏞的次子李道溥、三子李道洋，都留學日本。李道溥有很好的古文根底，從日本學習法律知識後，還做了律師，這在當時是一種很“洋氣”的新職業。李道洋會吟詩弄文，還翻譯過日本學校裡的講義。李鏞的大兒子李道河編過劇本，讓家裡人自演自娛。這家人都愛好《紅樓夢》，巴金的父親、母親、大哥都各有一部。因此，李公館不只是一個官宦人家，還是一個詩禮傳家、文化氛圍比較濃厚的家庭。

李公館雖然封閉，也難以完全抵制外來文化。到了巴金這一代，兄弟們也都上了洋學堂，學洋文。巴金的大哥李堯枚高中畢業後，還曾想到上海、北京深造，將來到德國學習新興的化工專業。他這個意願沒有實現，因為祖父、父親另有安排。李公館這時就像一個容納著駁雜文化的社會，也像正在無聲地悄悄發生變化的社會。用唐詩中的一首詩來做譬喻，真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①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變化帶來了對這個家庭的人際關係、舊的生活秩序和思想觀念的衝擊。這個一度繁榮鼎盛的大家庭正面臨著新生代的挑戰。新生代出身於此，並將反過來成為反對和埋葬它們的叛徒。

3. 溫馨的童年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堯”是李家這一輩的排行。“棠”和“芾甘”取自《詩經》中的《召南·甘棠》篇。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大意是說，這棵小小的棠梨樹，人們不要去把它砍伐掉，這是召伯曾經休息過的地方。周朝召伯有德政，這首歌表達了人們對他的懷念。“芾甘”，小樹的意思。他早期發表文章，常用這個名字。巴金是他後來從事文學寫作時所用的筆名。

1909年，巴金的父親李道河得到了一項任命，攜帶妻兒前往川北廣元縣（今四川省廣元市）就任知縣。廣元縣在嘉陵江的上游，土地貧瘠，老百姓窮苦得一年到頭連玉米都不能吃飽肚。李道河生平頭一次獨立主持一個縣府的管理，所以也很勤於政務，想做出一點成績來。在他的治理下，政治似乎還算清明，兩年中間只發生了一件命案：這是一件謀財害命

^① 杜甫：《春夜喜雨》。

的案子，犯人是一個漂亮的青年，把一個同伴砍成了幾塊。李道河倒也沒有草率審理結案。

對於深居在縣衙門後院的幼小的巴金來說，廣元的生活是平靜而愉快的。廣元縣衙門很寬大。進了大門是一大塊空地，兩旁是監牢。前後有六七進房子，周圍還有草地和稀疏的桑林。巴金一家住在三堂。

白天，家裡聘請了一位劉先生給他們五個兄弟姊妹上課，課堂就在二堂旁邊。劉先生是一位溫和、善良的教師，輕易不責罵學生。他先教他們認方塊字，繼而教《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舊村塾常用的啟蒙讀物。這位劉先生似乎也多少接觸了一些新學。他會繪畫，有時候還要幫助李道河畫地圖。他的繪畫工具，諸如彩色鉛筆、圓規等等，在當時可算是比較“先進”的了，使巴金感到好奇而羨慕。劉先生畫過許多人物和動物送給他的學生。這在巴金，都是非常珍愛的寶物。

課餘時間，巴金最親密的夥伴是比他長一歲的三哥堯林，還有一個比他們長五六歲的小丫頭香兒。香兒是一個活潑、聰明的女孩，長著一張俊俏的瓜子臉。她領著巴金兄弟倆在後院遊戲。有時，他們拾桑葚吃，吃得滿嘴紅紅的，不由得開心大笑。有時，他們比賽誰先在草堆裡找到雞蛋。有時，他們指揮雞群嬉戲，玩得非常歡樂。

有一個時期，每天晚上，在油燈下，他們兄弟倆依偎在母親身旁，她慢聲細語地教他們吟讀《白香詞譜》。巴金聽著母親的吟唱，體味著古代著名詞家的精緻歌詞，這成了他幼年時代的唯一美好的音樂享受。他們學詞的課本是母親親手裝訂，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抄錄的。這似乎是巴金最早接觸的文藝作品，也被巴金當作幼年時代的一樁樂事。

寧靜的夜晚，二更鑼聲響了，巴金兄弟倆結束了學詞，由楊嫂領著回房休息。

楊嫂也是他的童年時代的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不到三十歲的健壯的

女僕，對他們兄弟無微不至地關懷、照料，使他們過著一種舒適而愉快的生活。他們還常常躺在床上要求楊嫂講各種各樣神怪、劍俠的故事，然後懷著迷幻神往的情緒蒙矓睡去。

過了幾年，楊嫂病死了，死得很悲慘。由於病魔纏繞，拖延了許多時日，平日頗受大家喜歡的人這時漸漸被厭煩了，甚至盼望她早點死去。巴金兄弟倆到下房去看望楊嫂，看到原來活潑健壯、生機勃勃的那個年輕女人如今又瘦又黃、奄奄一息，心裡非常難過。她痛苦的呻吟聲使巴金感到恐怖。後來楊嫂還變得瘋瘋癲癲，解開衣服捉蟲子，捉一個，咬一口，邊笑邊罵；還脫了裹腳布放在嘴裡咬。

楊嫂的死，使巴金第一次接觸了“死亡”，看到了難以理解的世人的複雜情感，這在他的心靈上烙下了難以平復的創傷。二十多年後，他在所寫的小說、散文、自傳性質的回憶文章中，曾多次描述了這位農村婦女不幸的身世和悲慘的命運，以此來寄託他的同情和哀思。

總的來說，巴金覺得——

在廣元的兩年的生，我的確過得很愉快。因為在這裡，人人都對我好。

.....

沒有眼淚，沒有悲哀，沒有憤怒。只有平靜的喜悅。

在這個人人都對他好的家裡，影響最深的莫過於母親對他的慈愛和教導了。

4. 母親教我愛一切人

母親陳淑芬愛所有的子女，其中又特別喜愛巴金。也許因為他幼年時比別人更淘氣、可愛，也許因為他的生日和自己是同日，喚起了一種特殊親情。

她終年帶著溫和、親切的微笑，使人願意和她接近、願意愛她。在這個大家庭裡，家族之間有許多傾軋攻訐，明爭暗鬥，有著數不清的繁文縟節。對於一個長房媳婦來說，有許多難言的委屈和辛酸，但她從不在孩子們面前流露出來。巴金的父親李道河官運蹇滯。有一次，祖父李鏞花了好大一筆錢給李道河捐了一個過班知縣，到北京去驗看，結果未成功。消息傳來，李鏞生氣，兄弟妯娌冷言冷語，使母親十分難堪，只能偷偷垂淚。這些事情還是在許多年後，巴金從大哥堯枚那裡得知的。



巴金的母親陳淑芬

陳淑芬原籍浙江，隨她做官的父親移居四川。雖說，她在李公館是一位知縣老爺的夫人，卻少有一般官太太的惡習，而更像一位書香門第的小姐。她是一位聰慧、有見識、富有同情心的善良、賢淑的女性。她有才學，也有德行。她對人寬厚，注意教育自己的子女。她幾乎不用打罵體罰的辦法，總是耐心地輕聲細語地向孩子們解釋種種事情。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有一次，堯林打罵了香兒，她就責備說：“丫

頭和女傭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即使犯了過錯，你也應該好好地對她們說。”她說話溫和，但卻嚴格要求堯林保證改過。在日常生活中，她就是這樣對孩子們進行愛的教育的，培養了他們一種寬容、厚道的泛愛精神。巴金曾經這樣記敘道：

她教我愛一切的人，不管他們貧或富；她教我說明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僕，憐恤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們高，動輒將他們打罵。

母親並不是一個說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她永遠是忘了自己地去愛人、幫助人的。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夠在僕婢們的誠摯的愛護中間生長起來。

僕婢們把她當作他們的親人一般地敬愛。在寒冷的冬夜裡這愛也曾溫暖了那些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的心。

母親的這些思想當然只是一種樸素的、簡單的觀念。這樣一個在封建禮教教育下，關在閨房裡長大的女性，不可能接受外界更多的先進思想，從而形成自己更完整的、系統的觀點。但是，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傳存中，也可以找到某些類似的思想軌跡。儒家學說中道德規範的核心是“仁”。《中庸》第二十章解釋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就是宣導人與人之間要相互惻隱慈愛。《論語·學而》稱：“泛愛眾，而親仁。”就是宣導博愛大眾。墨子的“兼愛”說，即所謂“兼相愛，交相利”，“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在中國民間口口相傳的，也有許多這種做人的道德觀念。對於這些思想學說可以從不同角度去分析、評估，但是，對於一位天性志誠、仁慈的女性來說，她非常樂於認真、樸素地將其踐行在自己的言行中。

巴金的二姐堯楨曾經在楊嫂得病後，照護過巴金兄弟。這位比巴金大六歲的長姊是一個懂事、文靜的女孩子。從廣元回成都後不久，她患“女兒癆”病勢沉重。有人介紹四聖祠教會醫院的英國女醫生來治好了她的病。這件在李公館開風氣之先的創舉，恰恰是在巴金母親主持、同意下進行的——須知在當時十多年前，在成都發生過一次震驚中外的教案，四聖祠街的外國教堂被幾千人搗毀。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母親的勇氣和思想的開通。

從此，母親和那幾位英國醫生（修女）成了朋友。女醫生能說中國話，也曾應邀到李公館赴宴。母親特意叫人買了刀叉做了西餐。後來，她還曾多次帶巴金到醫院去玩或去看病。女醫生送了他們一些西式點心和圖書，其中包括漢譯的《聖經》。那本精裝皮面的書引起了巴金濃厚的興趣。他對那些和藹可親的外國女醫生也有美好的印象。雙方交往密切，直到母親去世。

可以想像，這些修女必然不會忘記自己佈道傳教的責任，有意無意間會通過自己的言行將其傳遞給她們所結識的朋友。天主教教義的核心就是“愛”，就是宣揚天主對人的愛，體現在人與人彼此相愛。這樣的思想與母親的為人是很投合的，這才有醫治病癆以後結成友誼往來的故事。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個奇特的現象：許多作家如魯迅、胡適、茅盾、老舍、豐子愷等等，都得力於母親的教育，才成為傑出人才。另外，母愛也是五四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正如冰心所吟唱的那般。但是，巴金從母親那裡得到的不是經世致用的教育，也不只是對於個人的母愛，而是對於人類之愛的長期熏陶。巴金懷著無限的深情描述過這種愛的教育：

使我認識“愛”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時候，她是我的世界的核

扭曲之夢

134. 在陷阱中掙扎（一）

從乍暖乍寒的早春天氣，到氣溫似乎漸漸升高，人們開始解除顧慮，講出一些心裡話。文學界中的青年作家也像其他領域的青年人一樣活躍起來。他們有較多的幻想，想做更多的事。他們很想聽聽自己尊敬的老作家的意見，這樣有助於自己的思考和實踐。巴金和章靳以、孔羅蓀訪問丁玲時，聽她讚揚過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巴金這時也連續接待過一些青年作家的來訪，像白樺、方之、陸文夫等等。江蘇省的方之、陸文夫是剛剛走上文壇的青年作家，他們幾位意氣相投，正在醞釀創辦一個青年刊物，名字也想好了，叫《探求者》。他們想在創作上多下功夫。巴金的文學生涯也是這麼走過來的，他當然很理解，也很贊成。但是，即使在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情況下，根據這些年的所見所聞，巴金還是有些擔心：現在能允許辦同人刊物嗎？他們太單純了，想得太簡單了，會不會招來什麼麻煩呢？但他又不便直截了當勸阻他們，只好很委婉地建議他們不要這樣做，但不知道他們聽懂了他的意思沒有。

1957年4月9日，《文匯報》刊出了周揚答該報記者問，大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4月27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普遍地、深入地開展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5月1日，《人民日報》報導中央國家機關開始整風，同時報導《沒有大“放”的原因何在？上海文藝界巴金等人對領導提出批評》的消息。……從5月到6月上旬，各地黨報、領導人都在熱心地鼓動人們鳴放，幫助黨整風。文藝界包括中國作協也連續召開各種座談會，聽取作家和藝術家的意見。



“文革”前夕的巴金

就在人們真誠地熱情地回應中共中央號召，提出各種批評和建議的時候，也就是在中共中央發出整風指示後不到二十天，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在共產黨的高層中秘密傳閱。他在文章中提出：“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有些被攻擊的‘教條主義’，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要革命。”毛澤東在這裡極為嚴厲地

強調：“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他對這個時期的鳴放定性，歸結為“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 “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毒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毛澤東的仇視和憤怒溢於言表，恨不得馬上把他們打翻在地。他還對右派的人數做了估計（也可以說是規定、指標），“所謂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至於反右派鬥爭的具體方法，毛澤東也有設想和安排，譬如“釣魚”“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等等。在他稍後寫的一個黨內指示中，他指示機關、學校、工廠對右派分子的活動，“要預做佈置，實行擋駕”。“街上貼反動標語，動員群眾撕毀。”“工人在此期間，不要提出福利工資等問題，一致對付反動派。”“要組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我們巧妙地推動左、中分子發言，反擊右派。此事很有效。”“注意組織中、左派寫文章。”“同時組織一些黨外人士演講，講正面話。然後，由較有威信的黨的負責人作一個有分析有說服力的總結性演說，將空氣完全轉變過來……”^①

讀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寫的文章，人們會被他那種強烈地渴望反擊的狠勁所震驚；就像3月時，人們聽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為他的談笑風生、真心誠意鼓動鳴放而折服一樣。那時他說：“現在是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過一會兒我們幫助黨外人士整風。”黨外人士不過在會上、在報上戰戰兢兢、和風細雨地說了一點意見；如今反過來，對付提意見的人卻是暴風驟雨、大會小會批鬥，當作階級敵人全民共討之，最後降級、開除、勞改、倒楣一輩子。由此想到一年多前毛澤東強調過十五年內“國際

^① 引文均見《事情正在起變化》《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引自《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23—429、431—432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國內的階級鬥爭會是很緊張的”，這才是他的真實的認識和看法。後來所謂階級鬥爭基本結束、“雙百”方針的提出，不過是形勢所迫、權宜之計而已。

一切都按毛澤東所策劃和導演的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6月8日，這場反右“大戰”在《人民日報》上正式開鑼登場，由社論《這是為什麼》拉開大幕，接著連續發表社論、各界人士談話、批判文章和批判會的報導……毛澤東親自撰寫許多文章參戰。文學界則以中國作協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來扭轉局面，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擊。如果借用毛澤東當時形容“右派”進攻的話來形容反右派真最確切不過：“一時好似天昏地暗……”

這樣一個驚心動魄、詭譎多變的政治氣候，對於巴金來說，是他以前幾十年的生涯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真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經歷和轉折。就在《人民日報》吹響反右派鬥爭號角後的一個多星期，6月17日，巴金奉命匆匆來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住在前門飯店，與四川代表、老友沙汀同室。斜對門住著的上海代表、《新民晚報》總編輯趙超構（林放），和他們時有往來交談。這次會議開了長達一個多月，直到7月20日才回上海，開得巴金在給蕭珊的信中叫累不止，叫苦連天，這是過去許多次開會從未有過的。

這次大會幾乎就是一次高層次的反右派鬥爭會議，各小組會捉對兒廝殺。譬如巴金所在的四川小組中有大右派章乃器，但是章乃器根本沒到會。人們照樣按照上面佈置，有組織地進行猛烈地攻擊。6月27日，巴金給蕭珊寫信說：“這次開會的確比往年忙，上午下午都開會，小組會開得多。章乃器也在四川小組，但是他根本不來開會。我一天弄得精疲力竭，晚上還有朋友來談。……我也真想休息一個時候……我打算會後休息兩天。好好睡半天覺。”6月30日的信中又說：“睡眠不夠，大家都覺

得累。……生活的確忙亂，思想也不集中。會開得很好。”這個時期巴金給蕭珊寫信很少談會議情況，這是少有的一筆。7月8日的信中又說：“我們一直忙著開會，白天整天開會，晚上或參加晚會或有人來聊天。晚睡早起，一天至多睡六個鐘頭，疲乏不堪。”7月12日的信中說：“每天都是如此，肉體與精神都相當疲勞。”在這封信中，他還提到“作協反右派鬥爭很緊張”。

顯然，巴金這一個多月的會議生活幾乎是一種煎熬。他聽人們沒完沒了、不斷重複那些揭發、批判，他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對哪些是錯。只見有的人誇誇其談，有的人義憤填膺，有的人虛與委蛇，有的人空話連篇……總之人們都在“深刻領會”領導意圖，揣摩當時風向變化，然後表態發言，“要啥有啥”。譬如說，如何提高了覺悟，擦亮了眼睛，受到了深刻教育，得到了巨大的收穫，等等，諸如此類。因此上面也就心滿意足，大勝而歸。

巴金從來不喜歡開會，1949年前幾乎不開會，這些年來偏偏掉在“會山會海”裡面，眼睜睜地看著時光流逝而去。對他這個從來勤奮、珍惜光陰的人來說，無異於是對生命的虛擲甚至是虐殺；何況這種緊張、可怕的批鬥會更是他不習慣以至恐懼的。他一生主張要善待人，要愛人，講人道，講人情，如今卻要兇巴巴、惡狠狠地去批判、攻擊、辱罵別人，他內心裡有說不出的煩惱和反感，但還不得不硬著頭皮聽會。於是，他只能採取混會混時間的辦法：當輪到他不得不講時，他就按照報紙說一通空話、套話。這個本事他也開始學會了。

這場反右派鬥爭是巴金從未想到過的，也是任何人都不曾想到過的，即使那些本來心存疑慮的人也不會想到招來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禍及上百萬人以至國家的命運的政治運動。巴金從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上感到氣氛驟變，無所適從；但到了北京參加會議，才真正感受到可怕的政治

壓力沉重地壓在自己的頭上。他看到聽到報上會上批判的那些所謂右派言論，就不能不聯想到自己前些時候寫的雜文、講過的話，那也都是類似一些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不照樣可以歸為右派言論嗎？想到這裡，他開始坐臥不安，他緊張害怕，不知前面的命運怎樣，別人將會怎樣處置他，是不是會把他揪出來大會批、小會鬥，發動文學界和讀者都來批鬥他。

就在這時，《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的女記者浦熙修到前門飯店來採訪他，約他寫一篇反擊右派的短文，而且催得很急，要求儘快用電報傳送到上海去。這在《文匯報》來說，也許是一種急於應變的措施，但也是貫徹上面所謂組織左、中派人士寫文章反右的要求。巴金不知道上面把自己看成什麼派，但卻可以藉此表態，保護自己，所以一口答應，當天就寫好不到一千字的短文交給了記者。第二天（6月21日）文章就在上海《文匯報》上刊登出來，題目叫《一切為了社會主義》。文章歌頌了毛澤東，批判有些人“欣賞毒草，迷戀剝削”“他們就成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巴金在文章中並沒有使用“右派”這個詞，說明他還是比較謹慎的，因為說一些不著邊際的空話、表表態，在那時似乎是無傷大雅的。緊接著，《人民日報》也來約他寫稿，當然要求態度鮮明尖銳。這次他是輕車熟路，更是一揮而就，隨即於6月24日刊出，題目叫《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儘管還是重複一些天天充斥在報紙上的罵人的空話，但這次巴金不僅不迴避“右派”兩個字，調門也大大地提高了。

這是反右派初期，巴金在幾天之內在幾家大報公開亮相的情況，但這並沒有使他感到輕快。瞬息變化的時局使他更加迷惑不解。那位《文匯報》女記者浦熙修在約稿後不到十天，就被《人民日報》7月1日社論（作者毛澤東）點名“是一位能幹的女將”，是右派中的“兩帥之間還有一帥”。這使巴金吃驚不已。巴金思想混亂極了，他哪裡分得清誰是右派，誰是左

派。他眼中看到的是，許多他所熟悉的朋友，都是一些有才華、要求進步的好人，但卻一個一個成了被攻擊的對象，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7月14日，周恩來邀請文藝界知名人士座談。巴金進入會場時，看見老友蕭乾很沮喪地坐在後排。因為他已被《人民日報》點名為右派了，有些熟悉的朋友見到他裝作沒有看見遠遠躲開了。巴金卻像平時一樣坐到蕭乾旁邊勸慰他：“你不要這麼抬不起頭來，有錯誤就檢查、就改嘛，要虛心，要冷靜。你是窮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這對身處逆境的蕭乾是很大的溫暖，因此他銘記在心。後來周恩來招呼巴金坐到前面去，巴金一邊向周恩來致意，一邊仍不放心地叮囑蕭乾“要虛心，要冷靜”。

住在斜對門的《新民晚報》趙超構原是一個談笑風生、豁達開朗的人，這幾天巴金卻看不到他的笑容。他顯得心事重重，沉默寡言。趙超構是一位雜文家，前些日子“鳴放”不少。巴金這時自己很緊張，卻也很為他擔心，又不便問他什麼。過了幾天，巴金重又聽到了熟悉的笑聲。因為他得到了上面的暗示：只要認真檢討就可過關。他馬上寫文章並連夜打長途電話傳送到上海，第二天文章在他主持的《新民晚報》上發表了，因而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而過關。

章靳以從上海寄來《〈收穫〉發刊詞》，說是要徵求編委意見。其實就是臨時要加上毛澤東提出的六項政治標準。巴金當然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似乎看到了頭上懸著一把可怕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落下來，不免又添了一份煩惱。

在這個冗長的會議期間，只要有空隙，他就去看望朋友；也只有和朋友在一起時他才感到輕鬆一些。他與曹禺常見面，他還去探訪沈從文、顧均正……

好不容易熬到會議結束，他特地到馮雪峰家去探望。馮雪峰在前幾年因《紅樓夢研究》一事受到挫折，如今處境仍不好。他是個資深的老黨

員，參加過紅軍長征，但還是書生氣很重，容易動感情。老朋友見面，還是那樣無拘無束，敞開心扉。巴金很尊重這位老黨員，聊天時就把這些日子疑惑不解的問題說出來，向他請教。其實馮雪峰又比他多知道什麼呢？但是他還是出於善良的願望想像這次運動不會傷害太多的人。他努力解釋一番。他和太太殷勤地拉著巴金到華僑大廈的大同酒家吃飯。馮雪峰平時生活儉樸是有名的，很少下飯館，如今做東道主拿著菜單卻不會點菜。巴金無論如何不曾想到，當時厄運已經逼近他的朋友，下次再見時將是另一番情景了。

135. 在陷阱中掙扎（二）

二十多年以後，巴金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不止一次地說：

我在 1956 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

1956 年鳴放期間我寫過文章，勸人運用獨立思考。不久反右運動開始，我又否定了自己。

現在再回過頭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多麼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1957 年下半年起我就給戴上了“金箍兒”。

那時，他的確是懷著一顆“戰慄的心”“整天提心吊膽”“一直戰戰兢兢地過日子”^①。巴金開完全國人大會後，回到上海也一樣不輕鬆，繼續

^① 巴金：《再思錄》第 10 頁；《隨想錄》第 705、704 頁。

陷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右會議中。從 8 月 16 日至 9 月 3 日，上海市舉行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會上做政治報告，題目就叫《深入反右派鬥爭，開展全民性整風》。原來說是整共產黨的風，剛剛開了頭，就變成要整全國老百姓的風，並稱各民主黨派各界各階級各階層“都應當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人大會成了鬥爭會，巴金參加了和周而復、柯靈、章靳以、郭紹虞等的兩次聯合發言，其中有一次就是批判復旦大學教授、詩人孫大雨。對於這樣的事情，巴金已經來者不拒。其實他何嘗了解孫大雨。巴金是上海作協主席，不能像開全國人大那樣只是聽會，現在不僅要主持會議（實際工作都是由作協黨組操辦的），還得講話。這時由他掛名主編的《文藝月報》的一位副主編王若望也被揪出來批鬥了。

這些日子陸陸續續傳來消息，他熟悉的、親近的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的，在北京除了蕭乾，還有馮雪峰。在浙江有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曾是新四軍老幹部的黃源，還有不久前與他一起到四川視察的宋雲彬。在江蘇有訪問過他的方之、陸文夫。在上海，還有給平明出版社出過巴爾扎克譯作的傅雷；曾是他三哥的學生，後來是他家的常客的黃裳；給他畫過像的畫家俞雲階……

在那動輒得咎、隨時可能捱批的情況下，他平時對青年讀者最為親切、友好、尊重的習慣也不得不有所改變。他過去對讀者來信幾乎是每信必覆的，在 50 年代忙亂的情況下，即使自己沒有時間，也要請蕭珊幫忙代覆，代為處理。現在他被驚嚇住了。有一封重慶的學生團體來信，請他為他們的刊物題詞。他對蕭珊說：“不回信也好。現在情形複雜，青年學生中間，有些人也有問題，尤其是要辦刊物的，所以我以後也得當心。”

這時，在北京的中國作協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對丁玲、陳企霞的所謂反黨集團的鬥爭。從 1957 年 6 月 6 日起到 9 月 17 日，借反右派鬥爭之

風，連續開了二十七次黨組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黨和非黨的作家，由二百多人發展到一千多人，發言的多達一二百人，成為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批判鬥爭會。不僅會內批，還組織左派、中間派人士寫批判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互相配合，以壯聲勢。巴金雖然身在上海，但他是中國作協副主席，又是上海作協主席，又是知名度很高的大作家，當然不會被放過，也照樣被組織寫文章參加鬥爭。他按照當時的口徑寫的文章題目是《反黨反人民的個人野心家的路是絕對走不通的》，發表在8月31日《人民日報》上，實際上他對這些鬥爭的是是非非又了解多少呢？

9月12日，巴金和章靳以等人應命又到北京參加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的最後階段，目的是讓更多的人包括像巴金、章靳以這樣非黨的或剛入黨的知名作家登台亮相，面對面地批判丁玲、陳企霞、馮雪峰。既是考驗他們的立場是否鮮明地站在黨的一邊，又是增加批判的分量，壯大聲勢。

9月16日、17日連續召開的會議已擴大到各省市區宣傳部、作協負責人，參加者有一千三百多人，在首都劇場舉行。巴金到時，會場已經坐了許多人。他看見馮雪峰坐在前邊，低著頭，那副沮喪的神情是巴金認識他二十年來從未見過的。這樣熟悉的、傾心相交的老朋友，從來被他尊敬的一位平易近人的黨員，一個耿直、真誠、善良的人，一個多月前，他們還在一起吃飯，敞開心扉聊天，巴金還向他請教反右派是怎麼一回事，如今一下子就變成了反黨分子。巴金讀到過《人民日報》上的長篇報導，說馮雪峰是“丁陳反黨集團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三十年來一貫反對黨的領導”，“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胡風一致”，還有“反動的社會思想”等聳人聽聞的可怕罪名。巴金不忍心看他也不敢看他。他多麼想和他談談，問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時的馮雪峰又是多麼需要朋友的說明、理解和辯護。但是在這樣的氣氛、這樣的場合，不僅沒有這個可能，而且

還要成為批判者去無情地面對面批鬥他，這是巴金五十多年人生中從未做過的事情。

17日，巴金上了台，做和章靳以的聯合發言。這天的大會是批鬥丁玲、馮雪峰、艾青……並且給他們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大會。中宣部主要領導陸定一、周揚都做了長篇總結性的講話。郭沫若也講了被認為“語重心長，很有革命熱情”的話。巴金和章靳以的聯合發言，模仿著人們的調子，從報紙上揀了一些材料編成批判稿，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馮雪峰“凌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聯”……巴金本來說話就有點口吃，這時唸稿子更是結結巴巴。他只想早點結束這個發言。雖說他不善言辭，但也從來沒有像這次說話那麼艱難。這樣也就沒有逃過主持會議的領導的法眼。作協秘書長郭小川在日記裡點評當時會場的情景：“茅盾講了好久，約1.5小時，巴金只十多分鐘……老舍講了一段很精彩的話，語言新鮮，意見尖銳，只多少有些油滑之處。”^①

二十多年後，巴金在反思這段歷史時說：“我只是跟著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我在1957年反右前講過：‘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倘使有人揭發，單憑這句話我就可能給打成右派。這二十二年來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話，它好像針一樣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責備我自己。”^②

在《聖經》的故事裡，常常可以看到那時候的人喜歡用石頭做武器去打自己痛恨的人。有一個著名的故事說，有一幫人捉了一個犯了淫罪的婦人，將她送到耶穌面前，問該怎麼發落。照摩西的律法是應該用石頭打死的。耶穌開始不理他們。後來被一再逼問，耶穌就說：“你們中間誰是沒

^① 《郭小川1957年日記》第194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隨想錄》第158頁。